

# 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 向教材插图的转化机制研究

■文/张宁

教材插图作为教材文本的视觉延伸,发挥着具象化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传递文化价值等多重功能。当前我国教材插图存在风格同质化、文化内涵薄弱、与学生审美脱节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教育对美育浸润与文化育人的需求。中国动画电影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就形成了以“中国学派”为核心的美术传统,从《小蝌蚪找妈妈》的水墨意境到《哪吒2》的创新,积累了兼具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海量美术资源。将动画电影美术资源转化为教材插图,既是对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提升教材质量的有效路径。

## 一、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 转化教材插图的可行性

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的独特价值,为其向教材插图转化奠定了基础。其核心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传统文化的视觉凝练。中国动画电影以“探民族形式之路”为宗旨,将传统艺术形式与美学精神融入美术创作。《小蝌蚪找妈妈》直接采用齐白石的水墨技法,通过笔墨浓淡构建灵动的自然意境,其“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追求,与中小学语文、生物教材中自然主题的插图需求高度契合;《大闹天宫》的工笔重彩风格,将传统年画、壁画元素与神话叙事结合,其角色造型的夸张性与场景设计的象征性,可为历史、语文教材中神话故事的插图提供范本。这些资源不仅是视觉符号的集合,更是传统文化精神的视觉表达。二是叙事逻辑的教育适配。中国动画电影具有天然的“叙事基因”,其角色设计、场景构建、色彩运用均服务于故事推进,这种叙事性与教材插图“辅助知识阐释”的功能内在呼应。《三个和尚》以极简的线条与色块区分角色性格,通过场景构图变化暗示情节冲突,这种“以形表意”的视觉叙事能力,可有效转化为道德与社会教材中寓言故事的插图语言;《天书奇谭》中“蛋生”角色的纯真造型与反派角色的夸张丑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通过美术语言传递价值判断的方式,与教材插图“隐性育人”的需求高度匹配。三是时代创新的风格演进。中国动画电影并非静态的传统复刻,而是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创新。新世纪以来,《大圣归来》融合了敦煌壁画元素与三维技术,《白蛇:缘起》以水彩质感重构了古典爱情,《雄狮少年》将岭南醒狮文化与现代青春叙事结合,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新国风”风格。这种风格演进既保留了文化根脉,又契合当代青少年的审美习惯,为教材插图突破说教感、实现文化认同提供了鲜活的资源。

## 二、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 转化教材插图的机制路径

基于中国动画电影的核心特质,将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转化为教材插图,需从资源筛选、艺术转译与教育适配三个维度出发,实现从艺术资源到教育载体的系统性跨越。

首先,多重评估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确保其所应用美术资源符合教材插图的育人需求。在艺术价值维度,需聚焦资源的美学独特性与文化承载力。优先选取能体现民族美学基因的作品,如《牧笛》中水墨晕染的空灵意境、《猪八戒吃西瓜》中剪纸艺术的质朴趣味、《天书奇谭》工笔重彩的典雅风格,这些资源不仅承载着传统艺术的形式美,更蕴含中和之美、天人合一等精神,能为教材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需考量美术风格的辨识度与包容性,避免艺术表达过于小众化,确保其视觉语言能被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学生理解和接受,如《三个和尚》的极简线条风格既保留了艺术个性,又具备广泛的审美适应性。在教育适配维度,需建立与教材体系深度耦合的筛选逻辑。依据学段认知特点分层筛选,例如小学低段教材宜选用《葫芦兄弟》中造型夸张、色彩明快的角色设计,契合儿童的具象思维特征;中学阶段则可纳入《大鱼海棠》中蕴含哲学思考的需求。按学科特性分类筛选同样关键,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插图可侧重于《大闹天宫》等具有叙事张力的美术资源,强化文本意境的可视化程度;生物教材中自然主题的插图则可借鉴《小蝌蚪找妈妈》中的写实水墨技法,平衡艺术性与科学性;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寓言故事板块,可选用《阿凡提》的讽刺漫画风格,通过视觉隐喻引导价值思考。

其次,对中国动画电影的美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实现视觉语言与教育功能的有机融合。其一,视觉符号的简化适配。将动画电影中的动态造型与复杂场景,转化为符合教材版式的静态符号系统。例如《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翎羽装饰与云端场景,在适配历史教材的“神话传说”内容时,需剥离繁复的纹样细节,保留金箍棒、虎皮裙等核心元素,以简洁的线条勾勒角色特征。其二,叙事逻辑的聚焦适配。动画电影一般为多线叙事且充斥着戏剧化场景,需转变为聚焦教材知识点的单一阐释维度。如《三个和尚》中“寺庙失火”的高潮场景,在转化为道德与法治教材“合作”主题插图时,需剥离火灾的紧张冲突,仅保留三人合力抬水的核心动作,通过构图突出

协作的行为逻辑,剔除与主题无关的环境细节。其三,情感表达的适度适配。动画中强烈的情绪张力需转化为贴合教材理性基调的中性表达。《哪吒闹海》中自刎场景的悲壮感,在适配语文教材的“反抗精神”主题时,需弱化血腥与悲情元素,通过紧握乾坤圈的手部特写与坚毅的面部表情,传递“不屈”的精神内核而非激烈的情感冲击。

最后,动画电影美术资源在转化为教材插图时,需实现知识传递、审美培育插图的育人需求。在艺术价值维度,需实现插图与教材文本的语义共振,通过动画美术的具象化优势消解抽象知识的理解障碍。例如,物理教材中“力的相互作用”章节,可借鉴《崂山道士》中穿墙术的视觉隐喻,以道士穿墙时身体与墙体的受力形变,将抽象力学原理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叙事,使插图成为文本的“视觉翻译”。在美育层面,需借助动画美术的形式美培育学生的审美感知力,这种培育并非孤立的技法展示,而是与学科内容的深度融合。如语文教材中边塞诗单元的插图,可借鉴《九色鹿》的壁画式构图,以赭红色调与线条的张力再现“大漠孤烟直”的雄浑意境,让学生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同时,感受传统绘画中线条传情的美学特质。在文化层面,需对动画美术中的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激活,避免只进行符号的简单挪用。例如将《大鱼海棠》中“椿”“湫”的服饰纹样与《山海经》中的神话意象结合,转化为历史教材中描述先民宇宙观的插图,通过教材插图中的图腾符号与场景设计中的天地格局,引导学生从视觉元素中解读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三个维度不会割裂存在,而会形成相互支撑的育人闭环。

## 三、结语

中国动画电影美术资源向教材插图的转化,是一个将优秀文化资源与教育需求进行创造性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资源筛选的精准性、艺术转译的创造性、教育适配的协同性,既解决了当前教材插图的质量短板,又为动画美术资源开辟了新的价值空间。长远来看,这种转化不仅能提升我国教材的教育效能与文化品位,更能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美与善的种子,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目标,同时推动动画产业与教育领域实现跨界融合,形成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基金项目:咸阳师范学院2025基础教育实践研究项目:中职美术教材插图对学生审美素养的影响研究(sjxm202535)

# AI生成影像技术对电影艺术创作 主体性边界的挑战与拓展可能

■文/孟雨村

生成式AI技术的迭代创新,已促使影像创作从人机工具协作进入人机创意共生的新阶段。在电影领域,AI不仅能完成分镜设计、场景生成、特效合成等技术性工作,更能够介入剧本构思、角色塑造甚至情感表达等创意环节。这一变革直接触及电影艺术的核心命题——创作主体性。传统电影创作中,导演、编剧、摄影师等创作者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审美判断和情感投射构建主体性边界,而AI的介入使这一边界面临解构与重构的双重张力。

AI生成影像技术对电影创作主体性的挑战并非单一维度的冲击,而是从创作权力结构、艺术价值根基到情感表达本质的系统性重构。这种挑战既体现为创作者角色定位的动摇,也显现为艺术独特性消解的风险,更深入到创作中人文情感维度的疏离,三者共同构成了对传统电影创作主体性边界的强力叩问。

挑战一,创作者角色的“去中心化”。传统电影创作中,导演作为作者,通过个人审美体系与艺术意志统摄全片,形成以人类主体性为唯一中心的创作结构。而AI技术的介入正在瓦解这一范式。在分镜设计环节,Runway ML等工具可基于导演的文本描述,同时生成数十版黑泽明、韦斯·安德森等风格的分镜方案,使导演从“原创者”退化为“筛选者”;在剧本创作中,OpenAI的影视专用模型能够分析类型片的故事逻辑,自动生成包含起承转合的多版初稿,削弱编剧的创意首发权。更深刻的变革在于创作权力结构的扁平化。Netflix等平台开始使用AI分析观众行为数据,反向干预剧情走向,使市场算法成为隐形的“创作决策者”。这种去中心化不仅是技术分工调整,更动摇了创作主体性的本质。

挑战二,艺术原创性与独特性的消解。电影艺术的原创性根植于人类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创造性突破,而AI生成影像的底层逻辑是对既有影像数据库的统计性重组。这种技术特性使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革新,如AI能模仿王家卫的光影美学生成相似镜头,却无法复现《花样年华》中梁朝伟眼神里的时代怅惘;能拼接希区柯克式悬疑桥段,却难以创造《惊魂记》浴室杀人戏那样颠覆叙事传统的镜头语言。2024年AI参与创作的科幻短片《数字乡愁》就因与《银翼杀手2049》的场景设计高度重合而引发争议,体现了算法对经典作品的无意识复刻,这种无意识复刻所带来的风险

在于“类型固化”的恶性循环,即AI通过分析票房数据优先生成符合市场偏好的影像模板,导致创作者在高成功率的诱惑下进行套路化创作。

挑战三,创作情感与人文精神疏离。电影艺术的深层价值在于创作者将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可共享的情感共鸣,这种转化依赖人类对痛苦、喜悦、救赎等生命状态的本体认知。而AI生成影像剥离了这一认知基础,其通过分析百万级影像数据中的情感符号(如阴雨天气与悲伤情绪的关联、慢镜头与怀旧感的绑定),构建“情感算法”,却无法真正理解符号背后的生命重量。例如,AI可生成“母亲送别子女”的催泪场景,却永远无法体会导演是如何在镜头中凝结自己与母亲的离别记忆的。这种符号拼贴式的情感表达,导致电影作品的人文维度逐渐扁平化。在传统电影创作中,创作者的道德困境、时代困惑会自然流淌在叙事肌理中,而AI生成内容往往停留在对主流价值观的安全复制层面,回避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挖掘。

尽管AI生成影像对传统创作主体性构成了多重挑战,但技术作为人类创造力的延伸,其本质仍是拓展而非否定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从辩证视角来看,AI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传统创作的技术壁垒与思维定式,更在实践能力、创作模式与表达维度上为电影主体性注入了新活力。这种拓展并非对人类主导地位的削弱,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创作主体能力边界的延伸与重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突破创作的可能性边界。在创意构思阶段,Midjourney等AI工具能将抽象文本转化为具象视觉。例如创作者输入“量子纠缠状态下的巴洛克宫殿”这类超验想象后,AI可在几分钟内生成数十版风格迥异的可视化方案,帮助人类突破经验对想象的桎梏。前期筹备中,Runway ML等工具的实时渲染功能使分镜设计从静态草图升级为动态预览,导演可通过调整参数即时看到“雨天街道的100种光影变化”,大幅缩短创意落地试错的周期。此外,独立创作者可以借助Sora等生成器,低成本完成万人战争场面、星际穿越特效等以往依赖亿元级预算的视觉奇观。在后期制作中,AI的智能抠图、多语言配音同步等功能,使中小团队也能达到工业化制作水准。上述技术赋能形式,不仅拓展了电影创作主体的实践能力,更重新定义了创作边界,得以延伸电影艺术的想象边界。

其二,重构人机协同的新范式。

借助AI生产影像技术,创作者可与AI合力形成人类创意主导、AI技术响应的动态协作闭环,在创作全流程中重构主体性的实现路径。在前期构思阶段,人类创作者以生命体验为内核提出核心命题,AI则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视化方案。例如输入“2077年上海弄堂里的老人与机器人共处”,AI可分钟级生成数十版融合市井烟火与科幻元素的场景草图,为人类提供跨维度的创意参照。中期制作阶段,这种协同体现为精准执行与艺术调控的分工,如AI通过参考摄影灯光数据库,可自动生成符合情绪基调的布光方案,但最终的光影叙事符号意义仍由摄影师根据现场氛围微调。后期优化中,AI承担重复性劳动如批量处理绿幕抠像、优化帧间过渡等,人类则聚焦情感校准,如通过调整AI生成的配乐节奏,使其更贴合演员表演的微表情张力。这种模式下,AI是创意的“放大器”而非“替代者”,人类创作者从技术桎梏中解放,得以将精力集中于价值判断与审美升华,形成人类定义方向、AI拓展边界的共生关系,推动创作向更具包容性的维度演进。

其三,拓展艺术表达新维度。AI生成影像的“非人类认知逻辑”为电影艺术开辟了超越人类经验的表达维度。人类创作者的想象往往受限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文化惯性,而AI可以通过算法处理跨领域数据,生成具有陌生化效果的影像符号。例如,实验短片《数据幽灵》利用AI分析全球近百年的地震波数据,将地质运动转化为抽象的光影流动,这种以数据为母题的影像表达,突破了传统电影对视觉符号的依赖,构建了全新的感官叙事语言。在视角创新上,AI能模拟非人类主体的感知方式,例如通过训练动物行为学数据,生成“鸟类视角下的城市变迁”,或基于量子物理模型构建“微观粒子视角的情感波动”。这种视角转换并非简单的炫技,而是将人类认知盲区转化为艺术表达的新载体。这种技术融合不仅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更重塑了观众的审美体验。

AI生成影像技术既拓展了传统电影创作主体性的边界,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创作者的核心价值并未被消解。未来的电影创作,创作者需以技术拓展可能,以人文坚守本质,明确AI技术的工具性地位,实现电影艺术与技术的共生共荣。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 中国法律电影中的“情法冲突”

■文/宋昭

着不同的看法,并在法庭上展开激烈争辩。影片中,三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因,其与叛逆儿子的关系,一开始坚持认为案件中孩子有罪,在争辩中开始反思自身家庭问题,尤其是与儿子之间的关系,继而改变立场支持无罪;曾经坐过牢的五号陪审员,因其自身经历而对司法系统秉持怀疑态度,始终支持无罪;作为检察官的八号陪审员,是第一个提出合理怀疑的人,他冷静分析案件证据,并引导其他陪审员重新审视案件始末,始终支持无罪观点。影片中激烈争论的情节,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也将个体情感与法律逻辑之间的对立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样的,由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主人公陆勇为了挽救生命而冒险违背法律规定购药,其善举之举与破坏市场秩序的罪责形成对比,当影片播放到病人们脱掉口罩致敬被警方,对一个“富二代”涉嫌杀父的案件有

之间的冲突被推向高潮。

法律电影中所体现的“情法冲突”,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在古代,人们在面对法律问题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家庭或亲情因素,例如,儒家倡导的“亲亲相隐”,认为在亲情面前,法律居于次要位置,凸显了家庭亲情的重要性;而法家“一断于法”的理念,以法律作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了法律的公正与严格,与儒家思想伦理形成强烈对比。在现代司法实践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亲属之间可能会因为亲情而不愿意揭发对方的罪行,这就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难题。如非行执导的电影《全民目击》,讲述了富豪林泰为了保护女儿而设计了一场“替罪”的故事。林泰为了家庭和亲情而做出的选择,正是传统文化思想中伦理意识的表征,而影片中辩护律师周莉在发现真相后却选择带走陆勇时的场景时,情感与法律

现得淋漓尽致。

社会的发展转型,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发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调整,当资源分配不均、制度不完善、文化价值观念相悖时,会导致社会矛盾发生,人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也会愈加明显。尤其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们的价值观念更新与法律体系的进步常常难以协同,“情法冲突”则成为司法活动的开展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以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为例,影片中的主人公秋菊为追求正义历尽曲折,面对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价值观念的冲突,秋菊始终坚持信念,最终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突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矛盾,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人情与法律的冲突难以避免。陈可辛执导的《亲爱的》,则以弃婴收养的法律争议为切入点,引发了观众对于法律与人性的深思。电影中展示的收养弃婴的善举与现

行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法律制度在满足人性需求方面的不足。在现实生活中,关于收养弃婴的法律问题较为复杂,在法律层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也需要考虑到当事人情感的多样性。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相关法律条文可能难以完全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的需求,也容易导致人情与法律产生矛盾。

清代但明伦在《谕谋随笔》的家训中讲道:“治讼狱者,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可偏废。”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协调一致、互补互用,构成了我国古代司法的传统之一,也是司法文明的表现。法律题材的电影以艺术化的方式处理情感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这也为观众搭建了一个讨论司法文明的平台。《十二公民》这部电影里,三号陪审员最后感动地改投无罪票,这其实就是理性最终战胜了情感。而《我不是药神》片尾提到药品管理法的修订,说明法律也在回应民意。这种电影的叙事方式,其实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情理相融”的司法智慧很像。在严格的法律条文之外,我们依然保留了考

虑情感和情理的余地。现在,像“枫桥经验”和“能动司法”这样的司法实践,就是这种传统智慧的现代应用。

影片关于人情与法律的较量,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在面对法律问题时内心的挣扎与抉择,不仅彰显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也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家庭、亲情、道德等情感因素时的复杂心态。在全面推进法治社会构建的时代语境中,法律电影中演绎的“情法冲突”给予了我们很大启示,即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专业的司法队伍,还要有一个深厚的法治精神的社会基础,让我们深刻了解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影片中庄重严肃的法庭,不仅是法律审判的场所,更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故事背后也体现了法律条文背后的人性关怀,不仅展现出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也体现了国人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探索与努力,这些努力不仅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更体现在人们的观念更新和行动上。

(作者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 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